

陶渊明探稿

魏正申 著

天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大家，又是歧见最多的作家之一。后世对陶渊明的研究始终不辍。

本书系作者近三十年来全面研究陶渊明思想及其诗文的结晶，共收入十八篇论文。文章对陶渊明的入仕与归田、诗文创作、艺术风格、友朋观、晚年思想、述贫与述耕等几个重大问题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于作者治学态度严肃，从大量材料中引出结论，使本书成为陶学研究中一部有特色的新作，不失为一家之言。

210

陶 渊 明 探 稿

Taoyuan ming Tangao

魏 正 申 著

*

文 津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苑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43,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54-041-1/I·13

定 价：2.95元

序

魏正申同志，196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已故著名学者逯钦立教授的学生。逯先生的主要业绩是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二百万字经他校注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外他研究陶渊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在逯先生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编后赘记》中曾说：“近代和现代学术史上对陶渊明的研究，在校勘、注释、考证和评论等四个方面取得成就之最大者，当首推逯先生。”对这一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逯钦立先生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功伟绩，在教学方面，特别是培养学生成材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逯先生的夫人罗筱蓀在《逯钦立传略》一文中说：“作为一个教师，他忠于职守，几十年来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刚来东北师大时，在师资匮乏、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他放弃了对专著的整理，同时承担起两个进度不同班级的古典文学课程，写两种不同进度的讲稿。每周讲授8小时至12小时之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逯先生讲课认真，特别是讲授陶渊明及其作品时，重点讲述自己多年研究心得，从而影响了许多学生喜欢陶的为人和陶的诗文。逯先生还具体指导有志于研究陶渊明的学生，魏正申同志便是受逯先生具体指导者之一。正申同志从大学读书时到现在，长期致力于陶渊明研究；三十年来他未因生活清寒而稍馁其志，“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也未随波逐流而暂易其辙，虚心向学，孜孜不倦，终于做出成绩来，而《陶渊明探稿》便是他多年来辛勤劳动的结

晶。

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陶渊明探稿》一书所体现的著者治学特点之一。著者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有两方面：一为陶渊明的全部诗文；二为史书。为此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大多数是令人信服的。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补充观点，提出个人一得之见，这是《陶渊明探稿》所体现的著者治学特点之二。著者在《陶渊明探稿》一书中所提出的新见解反映在六个方面：(1)入仕、归田：入仕带着从政和从文的双重目的；归田并非隐居，是从政不可得的转志，是从事诗文创作事业。(2)追求诗文创作：有事业感和自觉意识。(3)艺术风格：除平淡自然、金刚怒目的风格外，尚有幽默风格。(4)交友：友朋观；颜延之并非陶渊明挚友。(5)述贫与述耕：述贫并非真贫，是述志或托贫言时事；述耕，突出时代变乱。(6)晚年思想：有独特的社会发展观；晚年形成了以桃源理想为主要标志的桃源思想；对桃源思想的三重表述。上述新见解虽然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它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魏正申同志嘱我为其《陶渊明探稿》写序。我喜其为陶学研究增添了一部有特色的新作，谨写了以上的话，是为序。

吴 云

1989年8月17日于天津
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

目 录

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	(1)
“好读书，不求甚解”之我见	
——兼论陶渊明读书与诗文创作的关系·····	(13)
陶渊明入仕目的新探·····	(22)
论陶渊明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	(54)
陶渊明咏鸟的寓意探微·····	(65)
陶公以谐谑之趣述衷曲论·····	(74)
论陶渊明的友朋观·····	(88)
陶公与颜延之的交往新解·····	(100)
论陶渊明的社会发展阶段观·····	(110)
论陶公的桃花源思想之三重表述·····	(119)
陶渊明的无君论思想之我见·····	(131)
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看陶诗托贫言时事的旨趣·····	(137)
《饮酒》诗主旨蠡测·····	(145)
《咏贫士》七首新论·····	(155)
论《归鸟》·····	(167)
《九日闲居》浅议·····	(176)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旨归之我见·····	(183)
《拟古》诗九首探究·····	(191)
跋语·····	陈忠(203)
后记·····	(207)

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

陶渊明辞世后，第一个品评他的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称之为“幽居者也”；第一个为其写传的沈约把他列入“隐逸传”；第一个注意其文学成就的钟嵘在《诗品》中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于是，论陶家每以“隐逸”论之；笔涉“隐逸”，多称消极。尽管历代不乏诸如“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明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之议，然而，“隐逸”论相袭不绝，造成了“以往的人，都抱着一种成见来看陶渊明，使他久已失去原来的面目”（易润芝《试论陶渊明》），千古蒙冤。近年来，随着研讨之深入，学者们进一步发挥鲁迅先生“并非浑身是静穆”（《题未定草》之七）的观点，或提出陶公“是隐逸诗人吗？”的质疑（见《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四期高宇平文），或指出其“隐”“乃后人所‘赠’”，是“一场误会，千古诬冤”（见《九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二期徐新杰文），论陶文章中亦颇多以“归田”代“隐居”。可见为陶公辨“隐逸”、“消极”之诬渐趋大势。

笔者以为，陶渊明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功业，特别是他追求文学事业上的建树，以诗文传世的思想是应该进行深入探讨的。

陶渊明的一生中，注重生前功业、身后声名的思想，反映在陶集中的许多诗文里。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提出：

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公开申明人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聪明，应当凭着三正（天、地、人的正道）五常（仁、义、礼、智、信）而留名。他称颂自己的祖先“运当攀龙”的显赫，“专征南国”的武功，“惠和千里”（见《命子》）的政绩，“德音允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品操；赞扬李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感士不遇赋》）的业绩；歌颂荆轲“心知去不归”、“登车何时顾”（《咏荆轲》）的豪气。即或在“终死归田里”（《饮酒二十首》之十九）的情况下，也要“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想到的是“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之二），感叹“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衰世下，“士之不遇”（《感士不遇赋》）；尤其是对自己“猛志逸四海”（《杂诗八首·五》）的理想不得实现而耿耿于怀，“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同上其二），整日“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为“身没名亦尽”而“五情热”（《形影神三首·影答形》），反映了陶渊明以儒学的积极用世精神，急切地追求建功立业的思想。当然，诗人也时有“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愤语，但它是陶渊明面对黑暗时代，“有志不获骋”（《杂诗八首》之二）的牢骚，恰好从反面反映了他功业建树的急切感。

然而，诗人通过现实社会的分析，亲身入仕的体察，对“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命子》）的现实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归耕田园，放弃了在政治上的进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事业中去。这个由从政到从文的转变过程，陶渊明在《读史述九章·屈贾》中，借咏屈原、贾谊作了说明：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侯詹写志，感鹏献辞。

屈原和贾谊都在按着立德立功的政治理想努力进取，想要像稷和契那样辅佐圣君干一番事业，由于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屈原只得往请郑詹尹卜卦而写《卜居》，以设问质疑的方式，倾泻了他对那个社会的满腔悲愤，表示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贾谊也针对昏暗的现实，借鹏鸟入室而感叹身世，作赋自慰。陶渊明以屈原、贾谊由政治上进取受阻而化之为文学上的表现，从而显现了文学成就，暗示自己志向的转移。

陶渊明还在《咏贫士七首》之六中表示要像张仲蔚那样，专心地从事文学创作：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

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

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

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

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张仲蔚因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而“爱穷居”，“绝交游”，专心在文学创作上花功夫，“赋诗颇能工”。陶渊明尤其赞扬他“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的精神，为其不管个人穷通贫富，专心致志地追求文学创作事业所倾倒，表示了永远效法张仲蔚，从事文学创作的恒心。这是陶渊明继青少年时代所写《五柳先生传》，宣言“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的从文志愿后，再次表示自己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

我们还可以从诗人的绝笔——《自祭文》中，看出诗人在辞世前对自己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肯定和自豪：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捭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诗人指出自己的一生，与追名逐利的人大异其趣，为傲然地居于陋室之中从事文学创作而高兴，至死无憾。可见，从事文学创作事业是陶渊明终生的追求和志愿。

不止于此，陶渊明对从事文学创作意义的认识，使我们了解他的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这可以从对孔子补救浇薄世风的评价上谈起。诗人在《饮酒》之二十中写道：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不难看出，孔子在政治腐败、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努力弥补缝合，欲使其返朴还淳，虽然没有出现太平盛世，但礼乐暂得以焕然一新，是有贡献的。在这里，陶渊明强调的是孔子的进取精神，他之从事文学创作事业，正是在政治上无法进取而求其次的举动，这和孔子当年所遇到的问题在情理上相通，陶渊明恰恰通过肯定孔子在无法从政的条件下致力于补救世风而肯定自己的从文价值的。

综上所述，陶渊明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追求是从政不可得的转志，是遵照儒教用世精神的积极进取，表现了一种建立功业的强烈意识。

二

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陶渊明的诗文与时代气息相通，写出了自我。人以诗传，主要取决于诗的内容，取决于反映时代的力度。可以说，诗文中作者的鲜明爱憎观点，乃是诗文能否传世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抒情诗说，尤其要写出观点鲜明的自我，“诗之中须有人在”（吴乔语，转引自《谈

龙录》)。写出这一时代、这样环境、这一事态中的“我”来，使读者读其诗明其人，给人以认识、理性和美感，透过“我”认识一个时代。

可以说，陶渊明除了由于虑及自身安危，较少直接涉及时事外，对其所处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都有深沉的思考，态度鲜明地显示着自己的斗争历程。以陶渊明坚决对慧远等佛教神学的斗争为例言之，诗人针对“神不灭”论写了《形影神》，严肃而鲜明地坚持神形俱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从诗文传世的角度看，陶渊明胜人一筹处在于，他在诗序中特地指出了“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公开指明：希望那些关心这个问题的人，都能领会他的本意，从中得到启发。这样，与读者直接沟通了感情，为观点交流架起了一道桥梁，尤其为后代读者了解自己写诗的缘由予以醒目的提示。

“诗言志”(《尚书·尧典》)，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晋书·陶潜传》)，“酣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面对晋末宋初的战乱时代，是出是处已成了政治态度的鲜明标志。陶渊明常独标诗格以示志，尤见其以诗文传世的用心。陶渊明认为，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云》)的时代，入仕是与昏庸的统治者同流合污，入仕只能是那些“狂驰子”们“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的拚命追求，与自己“大济于苍生”(同上)的理想水火不相容，正是他“志意多所耻”(《饮酒二十首》之十九)的。他以躬耕园田否定仕途道路；他明明知道“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咏贫士七首》之一)的道理，却坚持“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的信条。陶集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述贫，真切地写出“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那穷困生活的窘境，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志：“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提示人们以诗文传世的衷曲：“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诗人之“述”，不只是以诗述贫，更是以诗述志；后代之“闻”，恰是陶渊明的人格、诗名。

陶渊明还十分注重塑造真诚坦率天真自然的自我形象以达到传世的目的。陶渊明多写抒情诗，陶集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具体、鲜明、楚楚动人。诗人研读时那“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的执著；劳动后那“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之三）的喜悦；闲居时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之五）的恬静；感于志不获骋时那“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八首》之二）的激愤；思友时那“相思则披衣”（《移居二首》之二）的诚挚；体验那“父老杂乱言，觴酌失行次”（《饮酒二十首》之十四）的欢快；少壮时那“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之八）的豪迈；家宅遇火后那“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沉思；变乱中那“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的忧虑，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可以说，整本陶集，是陶渊明的形象谱。钟嵘在《诗品》中所论“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一语道出了陶渊明的人格藉诗以传的真谛。

其次，表现在田园诗的写作和艺术表现上的刻意创新、争奇。陶渊明承继《诗经》的农事诗，独创田园诗，扩大了诗歌题材，上承《三百》、下启三唐的继往开来的地位，研陶家多有论及，此不赘述。值得探求的是，陶渊明思想上的突破与田园诗开创的因果关系，从而可见诗人以诗文传世的初衷。在那个耻涉农务、“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的社会氛围中，一个出生在几代做官的家庭、尚保持中小地

主生活水平的人，竟能直接参加田园劳动，与世俗相谬，这仅用求生计为理由是无法解释的；一个“游好在六经”（《饮酒诗二十首》之十六），对“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荣木》）的人，竟然离了“忧道不忧贫”的信条，甘冒违背孔教的嫌疑而“转欲志长勤”，仅仅用自求衣食温饱的原因也无法解释。看起来，陶渊明的躬耕尚有有意体察田园从而写出反映田园生活诗文的目的。诗人因有“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的躬耕喜悦，才独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美景；因有“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的整日劳作，才写出“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真实感受；因有“戮力东林隈”（《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勤苦，才产生与农民相通的“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五首》之二）的思想感情；在“披草共来往”（同上）、“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的真诚交往中，才赢得“农务各自归”的农友一起“登高赋新诗”（见《移居二首》），有可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一些农民思想愿望，学习民歌的表现手法。可以说，陶渊明意识到了写作田园诗与躬耕、交农友的关系。因此，田园诗的产生是陶渊明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客观有利条件的结果。当然，这些并不排斥陶渊明“历览千载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借鉴古人文化成就对开创田园诗的作用。

至于陶渊明在艺术表现上的刻意创新争奇，袁行霈先生在《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中指出：“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论析得精要透辟。从诗文传世的角度看陶渊

明，他确实在针对“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不正诗风，刻意追求创作出独树一帜的诗文，借咏西王母“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二）以自况，高度评价自己不同凡俗的诗文，有如东园中松草相间，经霜后的青松高枝独出，“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二十首》之八），有如清风中“见别萧艾”的“幽兰”（同上十七首）。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的诗风，独标诗坛。从《闲情赋》看，陶渊明不乏雕琢语言的才气，但是，他偏要采用“田家语”（钟嵘《诗品》）写作诗文，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更促其诗文的流传。今天看来，正是“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这样明白如话的诗句，为诗人夺得“六朝第一流人物”（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上）的赞誉。

从文学样式上看，陶渊明驾驭了先秦到晋各种诗体，四言、五言皆备，尤其是五言诗是唐前五言古体的最高成就；辞赋，抒情特色浓烈，清新素朴；散文，记、传、赞、述、疏、祭文，样式齐备，各有特色，无不在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追求，在文苑的长卷中寻找自己的闪光点。

第三，表现在诗人重视诗文的传播方面。陶渊明尤为重视自己诗文的传世，并有意地借助三种主要方式。

其一，请朋友书写、传抄。《饮酒·序》中指明了这种方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詮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聊命故人书之”，诗人有意邀请老朋友书写，使其大量诗文飞出书房，传播于世，这就为陶渊明逝世一百周年时，萧统为之編集、作序、写传创造了便利条件，使《陶渊明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

其二，在以文会友的探讨交流中传播，《移居》之一中写道：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重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特地选择了文学风气较盛的南村作新居，与有文学素养的“素心人”真诚交往，朝夕相处，事实上建起了以文会友的基地。诗友们“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直言不讳地品评过去的文学创作、作家、作品，争论热烈，彼此相得；诗友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彼此欣赏着各自写出的奇妙诗文，剖析文义，对疑惑处提出质疑，共同切磋，深入探讨。这个讨论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它促进了陶渊明诗文在交流中传播。

其三，通过多人参加的小型诗歌创作集会传播。《移居》之二中写道：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春秋佳日，诗友相呼，一起登山写作新诗，谈心论文交并。而且，这种创作欲望是那样强烈，“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这种创作集会，正是传播新作的好时机。有时，陶渊明有意识地加诗序以达传世的目的，《游斜川》的诗序就是一例：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阜。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纪其时日。

序中交待了诗会参加者的简况，活动的时间、地点、规模，诗作的主旨等等，使这些成为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诗文传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当然，上述的三点传播方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登高赋新诗”后“聊命故人书之”，“疑义相与析”后再“率尔赋诗”。这样，通过赋诗后的讨论，讨论中的赋诗，促使陶诗得以传世。

综上所述，陶渊明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欲有为而不能”（《朱子语类》），转而从文，反映他在事业上的积极进取，并非消极隐逸。他用“独起众类”、“莫之与京”（萧统《陶渊明集·序》）的诗文写下自己的斗争历程，并采用各种方式有意传世，是应该得到称扬的，陶渊明的诗文也果真传世了。